

APL881944-X

香港文化研究叢書

Hong Kong Cultural Studies

身份認同與公共文化

文化研究論文集

陳清僑編

G122

香港文化研究叢書

身份認同與公共文化

文化研究論文集

牛津大學出版社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New York
Athens Auckland Bangkok Bogota Bombay
Buenos Aires Calcutta Cape Town Dar es Salaam
Delhi Florence Hong Kong Istanbul Karachi
Kuala Lumpur Madras Madrid Melbourne
Mexico City Nairobi Paris Singapore
Taipei Tokyo Toronto

and associated companies in
Berlin Ibadan
Oxford is a trade mark of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First published 1997
This impression (Lowest digit)
1 3 5 7 9 8 6 4 2

身份認同與公共文化

文化研究論文集

陳清僑編

Identity and Public Culture

Critical Essays in Cultural Studies

Edited by Stephen C. K. Chan

© 牛津大學出版社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香港中文大學香港文化研究計劃

Programme for Hong Kong Cultural Studie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ISBN 0 19 590063 4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stored in a retrieval system,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without the prior permission in writing of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hina) Ltd. Within Hong Kong, exceptions are allowed in respect of any fair dealing for the purpose of research or private study, or criticism or review, as permitted under the Copyright Ordinance currently in force. Enquiries concerning reproduction outside these terms and in other countries should be sent to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hina) Ltd. at the address below

This book is sold subject to the condition that it shall not, by way of trade or otherwise, be lent, re-sold, hired out or otherwise circulated without the publisher's prior consent in any form of binding or cover other than that in which it is published and without a similar condition including this condition being imposed on the subsequent purchaser

版權所有，本書任何部分若未經版權持
有人允許，不得用任何方式抄襲或翻印

Printed in Hong Kong
Published b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hina) Ltd
18/F Warwick House, Taikoo Place, 979 King's Road, Quarry Bay, Hong Kong

序言

這一系列當代文化研究的學術論著，能於一九九七年在香港出版，值得略記一筆。本書的構想，源自一九九三年一月在香港中文大學舉行的「第一屆文化評論國際會議」，當年的主題正是「公共領域與公共文化」(Public Spheres and Public Cultures)。會議由香港中文大學人文學科研究所及芝加哥跨文化研究中心(Center for Transcultural Studies)合辦，並得到洛克菲勒基金會的贊助。大會匯集了本港及海外近二十所專業學院來自超過十個不同學科的研究學者，本集所收夏鑄九、何春蕤、傅大為、伍曉明、史丹利(Nick Stanley)及蕭競聰的論文，都曾在會上發表。卡鴻(Craig Calhoun)的論著本是為了參加大會而寫成，可惜後來作者因事未能赴會。泰勒(Charles Taylor)在會上發表了題為「西方現代性的文化想像」(Cultural Imaginary of Western Modernity)的講稿，論文集收的是他後來寫成的另一篇大作。

在籌組其他文稿的過程中，我們發現當代文化研究的成長空間極受現存體制所限，特別有需要尋找及開拓可供長期從事嚴肅工作的自由學術領域，為九七以後跨學科、跨媒體文化論評的長遠發展作準備。這就間接促成了「香港文化研究計劃」的創立，那是一九九四年夏天的事了。「計劃」設於香港中文大學人文學科研究所，為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U.G.C.)中央撥款項目之一。同年冬天，我們又創辦雙語評論期刊《香港文化研究》(Hong Kong Cultural Studies Bulletin)，每四個月出版一次，至今已出版七期。在一九九六年及九七年一月，我們相繼辦了第二屆、第三屆文化評論國際會議，分別以「現代都會的文化政治」及「文化、媒體與公眾」為題，推動當代文化研究在香

序言

港的發展。多年來，我們目睹了香港新生一代文化研究者在逐漸成長。

同時，我們更着手籌劃一系列研究項目，就我們能力範圍所及，分別在文學、電影、教育、流行文化、社會運動等不同方面的一些評論工作訂下時間表。一九九六年，香港文化研究計劃與牛津大學出版社商議合作出版一套《香港文化研究叢書》。本論文集就在這樣的情況下誕生。

因此，我要多謝諸位作者和譯者，他們付出了最大的努力，本書是他們應得的成果，此外，要感謝各位編輯顧問對我們的支持和信任，特別是鄭樹森教授長期在各方面的全力協助。牛津大學出版社策劃編輯對整個叢書的重視和監督，也是出版計劃得以落實的關鍵。香港文化研究計劃副研究員陳嘉玲和編輯助理葉蔭聰，在整個出版籌劃過程中擔任各種編輯事務，用心至為細微，於此向他們再三感謝。

最後，還要對一直默默支持及參與香港文化研究計劃的各同業及研究生衷心致意。可以肯定，沒有他們的工作，要展望前路是絕不可能的事。

陳清僑

一九九七年春

鳴謝

本書部份文章曾在其他期刊及書籍上刊登，承蒙作者、譯者及各出版社授權重刊或翻譯，特此致謝。文章包括：

中文

何春蕤 1994 〈台灣的麥當勞化：跨國服務業資本的文化邏輯〉

《台灣社會研究季刊》16:1-19。

夏鑄九 1994 〈（重）建構公共空間：理論的反省〉《台灣社會研究季刊》16:21-54。

傅大為 1993 〈百朗森林裏的文字獵人：試讀台灣原住民的漢書寫〉《當代》3:28-49。

英文

Appadurai, Arjun. 1990. "Disjuncture and Difference in the Global Cultural Economy." *Theory, Culture & Society* 7:295-310.

Calhoun, Craig. 1993. "Civil Society and the Public Sphere." *Public Culture* 5:267-280.

Taylor, Charles. 1994. "The Politics of Recognition." *Multiculturalism*. Ed. Amy Gutmann. Princeton: Princeton UP: 25-167. (中譯本蒙北京三聯書店允許刊載文章部份。)

Trinh, T. Minh-ha. "An Acoustic Journey." *Rethinking Borders*. Ed. John Welchman. London: Macmillan Academic.

作者簡介

陳清僑/香港中文大學英文系副教授，香港文化研究計劃主任

泰勒（Charles Taylor）加拿大麥基爾大學哲學及政治科學系教授

卡鴻（Craig Calhoun）美國紐約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阿佩杜懷（Arjun Appadurai）美國芝加哥大學人類學系教授

鄭明河（Trinh T. Minh-ha）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校區女性研究系教授

夏鑄九/台灣大學城鄉研究所教授

何春蕸/台灣中央大學外文系副教授

羅永生/香港嶺南學院通識教育學部講師，香港文化研究計劃策劃成員

譚萬基/香港浸會大學社會學系碩士研究生

戴錦華/北京大學中文系比較文學研究所副教授

史丹利（Nick Stanley）英國中部大學伯明翰藝術及設計學院研究部主任

蕭競聰/香港理工大學設計學院助理教授

蔡翔/《上海文藝》編輯

周英雄/台灣交通大學外文系教授兼文學院院長

伍曉明/英國色薩斯大學比較文學系博士生

王曉明/上海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教授

汪暉/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讀書》主編

傅大為/台灣清華大學歷史系教授

編者導論

公共性與文化認同

並析論述空間

陳清僑

「身份認同」絕不是一件容易確定的事。在我們的討論中，至少有兩重意義是至為關鍵的。一方面，在社會的認同中，自我必需能透過具體的生活實踐辨認出（identify）一己身份之所屬；另一方面，人在自我確認的漫長過程中又無法不受別人對自己認同與否（以至如何認同）所深深影響。假如說自我認同（self-identification）是任何個體受到別人承認（recognition by others）的前提，那麼，他者對一己身份價值的所思所想，又何嘗不是自我在發聲表述自己有別於人的獨特處時所依賴的衡度指標。

當代論者提出「公共領域」（*Öffentlichkeit*, the public sphere）（Habermas〔哈巴瑪斯〕1989/1962）和「公共空間」（public space）（Taylor〔泰勒〕1990,1995；李歐梵1995,1996）等極具啟示的論評範疇，其最主要的批判性思考，即在肯定維持某種公平（fairness）原則的需要，認為那是我們去重新瞭解整個多元複雜的文化認同過程時，所必當明白的現代身份認同政治的問題核心。這正是泰勒（Charles Taylor）〈承認的政治〉一文的探索起點。我們的社會到底需要具備怎樣的文化政治條件，你我始能在公平的環境中認識自己、對待

別人？泰勒指出，現代人在承認及誤認身份的同一性（identity）和差異性（difference）時，徹底體現了一種與傳統社會中以榮譽（honor）為身份認同根源迥然相異的文化認同指標。這裏指的是現代個體所推崇備至的自我尊嚴（dignity），引申而言，它更涵括了在現代社會裏人與人之間應當相互尊敬（respect）這樣的原則。是以，自我的「本真性」（authenticity）為別人所承認，意味着身份得到他者的認同；泰勒覺得這委實是人類社會的基本需要之一。

然而，誠如文化研究學者李湛愍（Benjamin Lee）所分析，身份認同政治在當代社會的發展迅速，早已超越單純依賴所謂「公平」原則所能透徹闡釋。現代人曾經要求大家以「平等」的精神看待個別「尊嚴」，也標榜採用「公平」的態度去「尊敬」別人；但經過六十年代以來各種各樣所謂「新社會運動」（new social movements）的洗禮，到了今天，我們務必特別堅持的是，個別性和差異性不但要被別人承認，還須得到相當的、甚至額外的強調。換言之，當前文化認同政治的探討，已不能被某種簡約的「公平」論述政治所取代，因為我們逐漸明白到，所謂「公平」原則，往往只是掩蓋本真自我個性和內在文化差異的「遮醜布」而已。再引申一層，我們也再不能停留在着意「協商」的平衡角力遊戲中，除非這「協商」是建基於某種具實的「公共視域」的文化政治（politics of public visibility）而達成（Benjamin Lee 1996: 125-6）。

李氏上述對「公共視域」的提法，或許正可補充泰勒的另一論點。因為，根據泰勒的分析，要在公共領域中探索「平等承認」政治（politics of equal recognition）的需要，就得正視文化認同過程中的「對話關係」（dialogic relationship）：

我對自己身份認同的發現，並不意味著我是在孤立狀態中把它炮

製出來。相反，我的認同是通過與他者半是公開、半是內心的對話協商而形成的。這就是內在生成的認同理想。……我的認同本質性地依賴於我與他者的對話關係。……在社會層面上，認同是在公開的對話中構成，而非由社會預先制定的條款所確定，這種對身份認同的理解使平等承認的政治日益成為重要的中心議題……拒絕給予承認可以對被否定的人造成嚴重的傷害。

（〈承認的政治〉）

在「對話式」的認同關係中，我們要求個人及羣體的獨特性平等地受到別人承認，盡量希望保存自我與別不同的獨特認同。可正因如此，我們發現文化身份構成和公共認同過程之間存在着深刻的矛盾。泰勒指出，現代社會所不斷滋生的文化認同訴求，在一方面，它「要求我們承認並給予地位的，正是一些無法普遍分享的東西」；而另一方面，它又極力希望「把非歧視（non-discrimination）重新定義為一種根據差異來區別對待（differential treatment）殊異分子的認同策略」。及至殊異性的基本要求無法兼容於自由主義「普遍意志」的文化同一理想時，當代身份認同過程所涉的複雜文化政治問題，便得從「平等承認」的單元論述範疇，被移置到以尊重差異性為認同基礎的多元實踐模式中處理，這便是「差異的政治」（politics of difference）介入當代一切有關「公共性」（publicness, publicity）的內涵構成的背景因素。

在「往返差異的文化政治」這部分的理論整理中，還有卡鴻（Craig Calhoun）的〈民間社會與公共領域〉一文。在此作者着手從社會組織模式和多元論述/政治參與的雙重角度，進一步闡析差異政治的具體可能性及局限性。他首先一語道破，指出「民主包含性」從來不只是個量的問題。此處卡鴻跟泰勒強調主體性的說法互相呼應，卻提出主體的實效必須能在社會行

動和生活實踐中體現。卡鴻彷彿把泰勒所重覆述說的個人尊嚴，具體落實為社會給予人民發揮組織自己能力的運動空間。換言之，在探求差異的文化政治據點時，卡鴻特別注意現代的「政治社羣」如何在國家權力範圍以外凝聚及發展民間自主組織的能力。這當然是驗證「差異」為「認同」核心的有效視野。民間組織的運行，是民間社會（civil society）為踐行者（作為個人、作為羣體）所提供的有效身份認同途徑之一，這點是無可置疑的。

然而，在公共領域中進行的、以理性論述為基礎的文化政治參與，問題就較為複雜。根據哈巴瑪斯的分析，在參與理想中的公共領域以前，「私人領域」（the private sphere）也為個人提供了構成行動者的身份認同及其他各種非理性範疇的支持。也就是說，從認同構成的本質來看，這私人性的過程（包括所謂「親密領域」（intimate sphere）及份屬私己生活的種種制度和實踐）佔有關鍵的位置。在此，卡鴻清晰地說明，文化政治的含義及影響必需在認同構成的過程中確定。

由於身份認同所要解決的基本問題是差異的政治，公共性的討論必然要重新放上相關議程。公共性既涉民主文化的精粹，其涵括性必極廣闊，舉凡想像和論述的空間、真實的社會公共空間，以及感知的、表徵的社會生活空間，皆為可視為公共生活對私人領域的滲透和包圍。（幾種空間的具體特性，詳見夏鑄九在〈（重）構公共空間：理論的反省〉一文的透徹評述，此處不贅。）因此，卡鴻認為，「我們要將認同構成理解為公共生活過程的一部分，而不是在公共領域出現以前，便可於私人空間中解決的問題」。是以，公共領域之徹底開放，實有賴上述各種公共空間（包括處核心位置的公共論述空間）的具體規劃和建構。事實上，卡鴻也秉承哈巴瑪斯的理想，認定民主的最終體現乃視乎「公共性」能否滲透社會生活空間的全部：

若公共空間能以民主制度的形式生存及成功地運作，那就代表了組成民間社會的人民具有一定潛能，從而可以運用理性批判論述去扭轉他們的生存條件。因此，參與公共領域不單有解決紛爭或策劃行動的可能，更有改善身份的可能。（〈民間社會與公共領域〉）

現實當然不比理想。正如民間社會與公共領域之間存在距離，在民間自發的認同運動所標榜的「差異性」和理想公共空間所追求的「普同性」之間，也的確滋生了許多解不開的矛盾結。本集的第二部分便以公共利益及理性往往操縱於國家和資本的霸權為前提，放眼當代社會斷裂秩序下的「救贖」和「消費」兩極之中，去探索個別處境裏「文化再現的社會空間」。夏鑄九的理論闡釋和指引最清楚不過了：任何具實的「社會生活」都需要一個為公眾共同使用的生活空間。何春蕸更以台灣麥當勞「速食」連鎖店為例，細緻而深刻地說明了差異文化（在地青少年的「慢玩」式次文化）與普同空間（全球文化資本的「馴訓」消費規範）之間，既似對立又實際相容的微妙關係。〈台灣的麥當勞文化：跨國服務業資本的文化邏輯〉一文最精彩之處，在於作者能在分析跨國資本如何吸納本土勞動力和次文化之餘，指出在這種生活空間中得到建構的主體性，正包含新興的都市情感與象徵內容。按照何春蕸的解讀，我們甚至可以推論，那些在從「速食」到「慢玩」的文化認同過程中被召喚而成的「在地主體」（local subjects），既未完全失去卡鴻所說的人民自我組織能力，又似無損泰勒所謂「本真性」的個人本色。

資本的文化邏輯，到了阿佩杜懷（Arjun Appadurai）的嶄新理論構想中，更有不同的啟示。作者在〈全球文化經濟中的斷裂及差異〉一文中，為當代環球文化在所謂「解體中的資本」運作邏輯裏重新定位。在一種全新的文化政治圖像中，作

者提出了「族羣地形」(ethnoscapes)、「媒介地形」(mediascapes)、「科技地形」(technoscapes)、「金融地形」(finanscapes)、「意識地形」(ideoscapes)等五大環環相接的既斷裂又連貫的公共空間構成，並說明在這符號連環中塑造而成的個人主體，正佔據着各種地形視角所提供的最核心位置，而且「在建構過程中感受與回應各地形景觀帶來的影響」。阿佩杜懷以此多元圖像的構思，欲求補充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 1991/1983)「想像社羣」(imagined communities)的概念，為後現代公共生活的秩序與斷裂提供建構性的文化政治空間，使我們可在一個更豐富、更活潑的論述範疇中，重新觀察及分析人民、機器、金錢、影象、意念等文化經濟單元，如何在多重「想像世界」(imagined worlds)中往返流動、不斷變化。

卡鴻及泰勒都不約而同指出，如何在現代民族主義及相關的認同政治境況中處理文化差異的問題，將是當代文化研究者亟需關注的。阿佩杜懷更進一步闡明，從全球的文化經濟圖像來看，所謂國家民族，其符號意義已愈趨斷裂，往往只能依賴解體中的資本，在不規則運動中勉強維持着似連非接的想像同一體。他又提醒大家，在當今許多社會裏，「民族」(nation)跟「國家」(state)經常把對方收入自己的計謀企劃之中，互相吸納，從中套取或製造可觀的「公共利益」。

戴錦華在〈救贖與消費：從毛澤東熱到九十年代的文化描述〉一文，便分析了革命理想主義和商品消費主義在當代中國大陸公共空間裏的消長。作者從具體歷史文化的闡釋中透視一個嶄新的、以都市生活形式為本的「消費」民族，說明箇中主體如何在國家主義所統轄的「救贖」論述領域邊緣，挪用昔日人民所藉以普度歷史眾生的種種思緒情慾，務求消解並轉化長久積聚在普羅大眾想像世界中的回憶和禁忌，重新去擺佈、去消耗那屢次引領歷史出入災難浩劫的權威信念與意識形態。在

此我們明顯地看到，一種可貴的公共空間的開展，並不完全建基於民間社會的全面成形，反而是在一個中心離散的過渡時代，透過市民日常生活的混雜取捨而留剩下來，構成一道作者稱為「想像的救贖與回歸」之路。

〈救贖與消費〉確實提供了一則活生生的例子，讓我們理解今天的人民大眾在種種本地和全球的文經濟脈絡交接中，到底如何在他們所屬的流動生活空間裏築造一己的想像世界。史丹利（Nick Stanley）和蕭競聰在〈再現中國文化：深圳中國民俗文化村述評〉一文，則把這種公共文化所呈現的民族景觀與認同想像，放在同一時期另一個生活空間中來分析。深圳中國民俗文化村的格局，既提供了經濟特區日常生活的社會空間模式，又在以市場導向為指標的前線都市想像中重新審視諸如「民族」和「民俗」等流動景觀的再造。在一個意識形態無不被改革開放的企劃所移置的當代秩序中，所謂習慣與傳統，正如歷史和革命那樣，早在消費慾望和自我救贖的多元矛盾之間改換了新裝。

公共生活空間既趨於同一，其統攝個人主體在社會想像中所佔據的位置，實不容忽視。蔡翔便試圖總結近半個世紀以來，所謂公家體制配合國家機器的不斷發展，如何導致「私人性」在九十年代的當代中國於頃刻間成為炙手可熱的嶄新想像範疇。在〈私人性與社會想像在當代中國大陸〉一文中，作者指出五十年代的中國並不存在所謂「公共空間」，因為那是一個全民皆處體制之內的年代，「公家」單位統轄着個人日常生活的每一範疇，而「公眾」只是無數普遍而同一的「隱形市民」。吊詭的是，在此「公家」以外，並無「社會」——否則，後來用作指稱待業人士的所謂「社會青年」，便不會把「社會」隱含在一種游離於「公家」以外的形式構成，它所赫然覆蓋的「公共視域」，也不會暗藏着一些份屬「短暫、不

定、無靠、並且充滿政治貶義」的內涵。

誠如戴錦華所說，文化論者畢竟只具有描述文化的權力與可能。上述個別的評論者，皆在不同日常生活空間裏發揮他們論述文化的功能，並從不同方面展示了他們眼中公共主體性的形態和構成，進而為身份認同在當代社會所面臨的困難勾勒出一個繪圖。在論述層面上，戴錦華和蔡翔二位皆提到話語的空間如何擺佈文化主體的定位。但他們的批評導向，並不直接在探討論述領域和話語空間本身，及其對公共主體性所能發揮的社會文化功能。譬如說，民族主體性如何在當前種種流動文化的「地形景觀」中被主導的公共論述所構成？大眾市民的日常生活空間，又如何在四周的文化斷層與政治秩序裏被普及的論述模式和流行的批評話語所滲透、所締造？

在另一方面，羅永生對香港《明報》所代表的一種以中國國族主義為主導的文化經濟企劃的分析，也表白了他關注獨立輿論空間之萎縮及變形。〈從傳媒帝國主義到一個傳媒帝國的想像〉一文，徹底在論述層面上，就話語空間所能開拓、所能壓縮的種種，去反思香港當前的文化政治問題。作者指出，當前香港文化政治的暗湧就正好體現於重重「扣連闡述」（articulation）的過程中。透過解讀《明報》所表徵的香港晚過渡期的國族認同想像，我們在香港中國人這個積累重重的話語堆填領域中發現了崩裂和矛盾的慾望流程，也更深入地了解到「霸權」和「共識」的意識形態。羅永生在此試圖探索想像空間和論述空間的密切關係，並刻意從箇中的扭曲邏輯來透視香港晚過渡期歷史景觀的曖昧性公共訴求。

假若主流報紙輿論所疏導的公共空間，是承載一種以回歸為指標的過渡性文化想像，那麼，它所能締造的歷史主體，也必然是隱隱在這樣的以超級民族認同為界限的公共視域中被肯定、被確認。再進一步想，像當前香港社會所揭示的那種以跨

界別大眾傳媒為核心文化中介的消費資本主義格局裏，支配性想像空間的構成，實在無法不造就了受眾（從報紙讀者到電視觀眾）——被定位於既有公共視域的觀者身份位置（viewership, spectatorship）。在論述主體被引導去參與和介入公共想像的整個文化認同構形過程之中，個人憑藉其身份位置的「本真」取向去界定和選擇某種「自主自決」的生活方式，是至關重要、更無可厚非的。問題是，每一項最為「本真」的日常生活抉擇——從閱報到 phone-in 到觀看煙火到話說消閒電視——皆無可避免地在道地的消費層面上化成環球商品的慾望與差異。這樣的慾望主體參與其中，無法不使論者對傳統公共領域的合法性和合理性產生疑惑；尤為甚者，它更驅使我們重整自己的後設言談策略和想像視野，試圖在目下那種幾乎全面覆蓋我們日常生活的跨視域論述空間和泛商品文化景觀之中，再探獨立批判領域之可能。

譚萬基在〈愉悅、公共領域與「香港」身份：《龍門陣》的文化政治〉一文便嘗試去做這樣一件不太可能的事，欲求在主流電視媒體的中介過程裏，解構「普及性」、「商品性」、「公共性」以至「主體性」等這些流動不定的論述範疇之間的曖昧關係。在《龍門陣》這個流行電視 talk-show 的多重跨媒體論述連環構造的過程裏，不但文化認同和身份差異的邏輯變得虛弱、變得難以捉摸，甚至在香港景觀中被不斷放大的「說話公眾」，其主體性也只能在後殖民狀況半生未熟的時空中盡失僅存規範，而浮載於公共視域的認可空間裏。至此，論述空間之易得與難求，慾望主體之疏離和介入，便與後殖民文化認同政治中的論說情感、重述記憶、再提差異等諸多問題息息相關。這也正是我們於此從事當代公共文化研究時要把握的核心焦點之一。

論文集的第三部分更引領我們在不同歷史文化脈絡中探求

文化主體與認同論述之間的可能關係，並重點揭示在身份認同構成的過程中，異己（other）如何在人的內在本真性基礎上顛覆，以至形成一種必然涵括差異的自我意識。主體和論述之間的張力，自己和異己之間的對話關係，都在我們把身份認同重新呈現為社會程序的過程中得到剖析。周英雄和伍曉明探討的焦點是五四新文化時期中國知識分子看人與被看的慾望往來關係，而王曉明和汪暉則從不同角度剖析了在九十年代大陸市場經濟改革的狀況下發生的一場有關「人文精神」的論爭。無疑，知識分子在整個身份論述的不斷重覆展合中發揮了舉足輕重的作用，這個小專題的目的之一，也在於讓我們從實際的論述格局和困局中反思文化主體構成與社會權力分佈之間的關係，進而重探「知識」和「體制」之間重重積壓的文化政治脈絡。傅大為在文集的壓卷篇中便針對這個問題，提出了批判性、策略性的分析，並且著意把國族認同的霸權邏輯，置放在台灣原住民的漢文書寫這樣一個權力主導論述關係、論述支配主體構形的格局中，加以徹底解構。

換言之，透過不同的個案分析，或許我們可以更進一步瞭解主體慾望在變化不一的文化政治地形所走的迂迴路線，從而更深刻體會到認同與差異的多元關係及扣連過程。在〈身份之認同：從魯迅兩個小說推論〉裏，周英雄認為在文化身份認同的塑造中，人的自我意識「沿着時間、空間與文化三條軸線來回穿梭，替主角（主體）編織一幅錯綜複雜的自畫像」。在歸去來的往返路途上，知識分子的社會責任在反躬自問，自審其處身於想像社羣之中或以外的諸般角色位置。在〈自己與異己：西方面前的二十世紀中國文化自我意識〉一文，伍曉明把魯迅「狂人」的文化自戀效應，置放在從五四到文革以後的「新」中國歷史脈絡中，探索知識分子如何在種種「夷狄」壓抑的狀況下發掘自己內在的他者慾望。兩篇文章都採用了解構